

埃米莉·M·尤因斯的《辛亥家书》(上)

阙维民 沈昌洪

题记

2000年春,我在英国剑桥与几位清末民初英国入华传教士的后代的接触中,获得英国入华女传教士埃米莉·M·尤因斯(Emily Marry Ewins)的《辛亥家书》^①,由尤因斯的长子H·M·拉滕伯里(H. Morley Rattenbury)于1989年12月编辑作注成册,共辑录尤因斯从中国汉口、武昌英国租界循道会(Wesleyan Mission)发回英国的八封家书,分别写成于1911年10月15日、10月17日、10月29日、11月9日、11月19日、11月26日、12月10日和1912年11月3日。前七封家书是尤因斯在辛亥革命爆发期间(内容所述的时间起始于1911年10月2日,迄止于12月10日)、在辛亥革命爆发地(武昌与汉口)的所见所闻所历。第八封信写于1912年11月3日,内容则是对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一周年纪念日追忆。

尤因斯其人,未见载于任何人物工具书,仅在H. M. 拉滕伯里撰写的私著《拉特—赖梅——一家四代五牧师详传》^②中有关其丈夫H. B. 拉滕伯里的传记里有些述及。尤因斯,英国布里斯托尔港市人,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入华的英国循道会^③女传教士,主要从事教会医院的护理工作。辛亥革命爆发期间,在滞留武昌、汉

口的英国传教士中，尤因斯是为数不多的女传教士之一。她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用家书的形式记载了她所经历的辛亥革命过程。在辛亥革命一周年紀念活动庆典现场，尤因斯是被邀请而赴会的十一位外宾中的两位女性之一。

尤因斯是 H. B. 拉滕伯里 (Harold Burgoyne Rattenbury) 的第二任妻子 (她在第四封、第七封和第八封家书中，提及了 H. B. 拉滕伯里)。除了《拉特—赖梅——一家四代五牧师详传》中的传记外，H. B. 拉滕伯里也未见载于其他人物工具书。H. B. 拉滕伯里生于 1878 年，1902 年被循道会委职派往中国湖北传教，直至 1934 年被召回英国总部，死于 1961 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H. B. 拉滕伯里的第一任夫人布鲁尔 (Edith Brewer) 和两个孩子被疏散到上海，1912 年全家团圆，但 1912 年 11 月布鲁尔在分娩第三个孩子时死亡。

尤因斯是于 1914 年嫁给丧妻未及两年的 H. B. 拉滕伯里的，因此，她的《辛亥家书》一直由其姐姐希尔达 (Hilda) 保存着。20 世纪 80 年代，H. M. 拉滕伯里从其娘姨希尔达的女儿里格利 (Barbara Wrigley) 手中获得母亲的《辛亥家书》，并于 1989 年编辑、作注、打印、装订成册，分发给亲朋好友共享，而将原件 (包括 H. B. 拉滕伯里的信件) 保存在曼彻斯特大学的赖兰兹图书馆 (Rylands Library at Manchester University)。经辗转联系，笔者最终从居住在康福斯市 (Carnforth) 的 H. M. 拉滕伯里处获得了对《辛亥家书》的利用和引用权^④。

《辛亥家书》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是辛亥革命研究和中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作者以旁观者的身份，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在辛亥革命爆发期间所见所闻的一些具体细节，可以补现有资料之不足。2. 《辛亥家书》中所涉及的多位英国循道会传教士，均名不见经传，故成为英国来华传教士研究的新资料。3. 西

方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态度与涉入的过程，均在《辛亥家书》的字里行间隐约显现，为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资料。4.《辛亥家书》中所记录的一些细节，为寻找新史料提供了线索。

现将《辛亥家书》的八封家书全部译出，除第一封由我译外，第二至第八封均由沈昌洪译，最后由我通稿、校注。原注为尤因斯长子 H. M. 拉滕伯里所作。文中英文人名的中译以《英语姓名译名手册》^⑤为准，第一次出现时，括注英文原名。文中所述的星期某日，均在每段第一次出现时括注某月某日。

（阙维民）

家书一

亲爱的家人们：

我想你们一定会为远在他乡的我们感到焦虑，因为家书告诉你们的事件将足以使你们焦虑。我将往家发此信，此信已在 Brecknock 大街 4 号^⑥被传阅过，希望你们能转递给希尔达（Hilda），并请她将此信给我在学院的朋友们传阅。

我想从头讲起，告诉你们我所经历的一切。上周我将帕特（Pat）和皮洛（Pillow）小姐生病的情况告诉了希尔达，而贝尔（Bell）也在武昌刚从疟疾的肆虐中挺了过来。所有病号都已康复，但随着我的疲劳之极，便决定与贝尔一起回汉口度周末。因此，上星期五（10 月 6 日）我就打点简装，渡汉江抵达汉口。因为天气炎热，所以我仅带着一两件白色单薄衣衫，身着外套和黑裙。我本打算于星期一（10 月 9 日）返回，但抵达汉口后，我很想卧床休息一两天。我的确没有想得更多，因为我实在太疲倦了，只想休息。正因为如此，我没有看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武昌的一切骚动。大家知道，武昌是湖北省首府，军队的司令部所在地。驻扎着许多部队，他们均由德国和日本的外籍教官训练。由于满汉之间的种族反

感情结，多年来中国已产生了大量的不满情绪。汉人是真正的中国人，他们一直居住在中国，却在几百年前被满人所征服。现在满清皇帝仍然在位，所有中国的主要官员均是满人，他们欺凌汉人，残酷压制汉人，一切法规条令对满人之利要远优于汉人。然而，汉人最后决心不再忍受，长期以来，他们一次一次地努力，以求在政府中获得更多的席位。上星期一（10月2日），整个汉口都被下列消息震惊：警方获悉在汉口俄国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存有一些炸弹，还有一份革命党进攻武昌的计划。当警方前往搜查时，该幢房子已人去楼空，根据情报，所有造反者都到了武昌。因此，警方渡江前往武昌，关闭城门，全城搜捕。警方逮捕了30名造反者并就地处决。所有人都认为事情将就此罢休，但恰恰相反。星期二（10月10日）晚，武昌的许多士兵起义。整个夜晚，武昌城都处于混乱之中，到处都是枪声。在我们所住的院子周围，枪声似乎更为激烈。我们紧挨着军营，士兵射出的子弹在我们房屋的上方呼啸而过，一发炮弹打中了医院，但没有造成进一步破坏。夜晚，三十名忠于政府的士兵到我们院子里避难，其中一名士兵一大清早就派到我们这里购买白布供需品。因为一条白布绑扎在臂上就是革命党人的标志，所以他带着白布回去后，每个人都在臂上扎了一条，然后穿后门而出。他们前脚刚刚离开，一队造反者后脚就进院搜查，他们将一挺机枪架在大门前以防万一。星期三（10月11日）整整一天，武昌城都处于这样的极度恐怖状态，汉人士兵穿越于城镇里弄，凡是满人见者格杀勿论，所有士兵都成了造反者，但未伤及外国人。然而，我们的院子恰在枪炮射线之内，住在那里并不安全。医院的所有病人都被清撤回家，护士们也都撤离医院。阿伦（Allan）先生一家打算出城，但政府当局不允许他们出去，并向他保证他和他的家人都相当安全。但是阿伦夫

妇仍然十分害怕，所以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离开武昌。因此，阿伦夫妇及其孩子帕特（Pat）和皮洛（Pillow）小姐决定从城墙上用吊篮外逃，由我们的厨师和医院的厨师将他们往下吊到城外。城墙垂直到地面距离为四十英尺，两位厨师的手掌被吊绳磨擦得鲜血淋漓，但他们仍然坚持到所有人都逃出城外为止。一行人出城后就到了我们的高级中学大院，该大院位于城外，相当安全。他们在那儿一直呆到星期四（10月12日）下午，我国领事^⑦命令他们渡河到汉口。因为担心一旦炮轰武昌，高级中学将成为发起进攻的场所，所以一切外国人均从那里撤出。

以上都是武昌的事。下面讲讲我们汉口这边的故事，星期二（10月10日）一整天，我们都在听消息，星期二整天和星期三（10月11日）晚上，我们听到了枪声。接着星期四（10月12日）下午，英国领事馆来令，命令我们所有人在五点之前离开教会大院^⑧。我们大约只有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我的任务很轻松，因为我只有一些周末休闲衣服，所以很快就准备好了行装，然后准备所有人的食物和睡床，并在贝尔（Bell）和诺拉（Norah）送病人回家的时候，为他们做好护理安排。五点整，我们——克莱顿（Clayton）夫妇、布思（Booth）夫妇、修女艾丽斯（Alice）、贝尔、诺拉、明蒂（Minty）夫人与我——开始撤离。一艘汽艇已驶入汉江来接应我们，我们顺江驶往英国租界，尾杆上飘扬着英国国旗。下船后，我们被送入一间大空宅，这是当地一位乡绅慷慨地免费提供给教会使用的。

在这里，我刚刚听说邮政船将要起锚，所以我最好写到此处为止，明天起在下封信中接着再写。别为我们担忧，我们相当安全和健康。如果中国人没有什么麻烦的话，我们将会很高兴。

爱你们的 埃米莉

10月15日，星期日

于汉口英租界

为了节省时间，信封是请贝尔写的。

家书二

亲爱的家人们：

昨日之信匆匆而写，今天续写此信。我想，上一封信已告知我们在汉口租界的情况，一个大宅院借给我们作了免费避难所，院子空空如也，一片狼藉。无论如何，我们确实万分感激，有地方住就很不错了，还能抱怨什么呢。我们借到了几张席子，铺在地板上后，再把床单摊在上面。贝尔和我就在两张长藤椅上过夜。我们的房间里有五个人，大家挤在一起非常高兴。我们集中了所带的各色罐头，匆匆做了一顿晚餐，共有二十多人吃饭。餐后，我们几个未婚女子去帮助那几位太太们铺床，安顿孩子睡觉。最后，大家都落实了铺位，在这样的环境中尽可能地睡一觉。不时有枪声传来，但除此之外，一切平安。

星期五（10月13日）早上，留在武昌的人也过来了。我们雇用了三十二个强壮的仆人。我们的院子很大，人再多也可以住得下。星期五一整天，我和贝尔扎着头巾，清扫墙壁和天花板，并把我们要住的小阁楼打扫干净。修女艾丽斯（Alice）、诺拉·布斯（Norah Booth）、贝尔（Bell）和我四个人住在一起，我和贝尔睡在地板上的马鬃席上。一开始，我们睡在席上感到难受极了，但后来贝尔从医院带回一些东西，我们现在反而感到舒服多了。起初，我们常常会在半夜醒来，发出声声呻吟“哦，我的骨头，哦，我浑身酸痛。”真有趣，我们的房间里没有一点家具，甚至连日常换洗的衣服也没有。

后来，我们的厨师设法去了一趟武昌，给我带回一箱冬衣。这下，我过冬就没问题了。贝尔和诺拉也派厨师去取了些物品。我们不知道何时能继续工作，也许是一、二周以后，也许是二、三月以后，我们不得不做好准备，应付各种紧急情况。中国人都卷入了这场混战之中，那些有钱人已经逃往乡村或是被认为比较安全的地方。上周，租界里每天人满为患，挤满了想要逃往乡下的中国人，他们肩扛手提各色各样的包裹，有的人还把小孩和贵重物品放在竹筐里挑着走，有的人花大钱，让船家把自己带往长江的上游。但他们常常会在半路上遭到抢劫，所有物品被一抢而空。而在空城里，士兵们却竭力维持着治安，对抓获的偷盗之人一律格杀勿论。结果，城里的坏人全都跑到乡下去了，在那里大肆抢劫偷盗财物。

至今，革命党人旗开得胜，占领了武昌、汉口和汉阳。大批人聚集在他们的麾下。他们军纪严明，决不允许偷盗之事发生。

10月17日，星期二

于汉口租界

我写了以上内容后，又有几天过去了，形势发展得很快。上星期三（10月18日），领事馆发布命令：所有英籍妇女儿童必须离开汉口，直接转移到上海去。出发时间定在星期四（10月19日）晚上。我们一边收拾行装，一边抱怨：汉口非常安全，而我们却要丢下手头的工作，匆匆撤离到上海去，真是懦夫之举。然而，我们在这里也无事可做。星期四早上，我们再次整好行装。我们总是随时准备出发，可能是在某个午夜，我们就会带上挎包，登上一艘炮舰离开汉口。

星期四早上，我们奉命必须撤离了。突然，英国领事和英国海军司令温斯洛（Winsloe）副元帅发来命令：留四位英

国女士在汉口，随时准备护理受伤的士兵和志愿者，兼做其他工作，一位英国水兵作为这四位女士的警卫，以防出现危险。执行主席克莱顿（Clayton）先生当时并不在汉口，在他回来之前，人员的名单根本定不下来。有三位女士是肯定要留下的，她们是诺拉·布斯、修女艾丽斯（她俩是护士）和贝尔。但第四位人选很难定。大家认为帕特（Pat）太纤弱，而我们许多人都愿意留在汉口。最后，克莱顿先生回来了，他站在平台上，大声地宣布了名单，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布斯小姐，谢克尔顿（Shackleton）小姐^⑨，威尔金斯（Wilkinson）小姐^⑩和尤因斯小姐将根据副元帅和领事馆的命令留守汉口。我告诉你们，当时我有多兴奋。我愿做任何的事情，我的特殊工作就是在别人做护理工作时，为她们看看家，做些病号饭之类的事情。我有时也帮着做一些护理工作。现在是诺拉在看家，因为租界内未发生任何战事。除非租界遭到炮击或轰炸，欧洲士兵才能还击。但清军和革命党人都承诺：在任何情况下，不把战火引向租界。看来双方都能遵守诺言。我们唯一担心的是：其中一方军队战败后，会借道租界撤退，因为租界离汉口城最近。上周，离租界六英里的地方发生了激战，我们能清楚地听到枪炮声，我们还看到了长江上中国战舰群向下游驶去。听到消息之前，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枪炮发出的火光，革命党人赢得了胜利，据说有二、三百人受伤。但真相谁也搞不清，因为到处是各种各样的传言。我们今天得知，在同样的地方还将有一场恶战。克莱顿先生曾想带我们去参观一下防御工事，他听了这个消息后就放弃了，过几天视情况再定。布斯医生（Dr. Booth）的医院里来了许多伤员，伦敦会^⑪医院也有不少，人们想组成一个红十字会，但又非常担心敌对双方不会理睬红十字旗帜。中国人看来已经知道红十字旗能保佑他们平安，很多人在房顶和商铺顶

上插上了红十字旗。不用说，这样一来事情变得更复杂了！

我们都希望革命党能取胜。如果清军赢了，中国又要陷入混乱之中，新的思想根本不可能得到实现，甚至还会有一场可怕的大屠杀。如果清军真的赢了，老百姓们希望武昌、汉口和汉阳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许多中国人公开说：他们等待着结果，再决定支持清军或是革命党。不过，他们的内心还是愿意革命党能成功。汉口的轿夫们会抬着想看一看打仗的人前去观战，分文不收。如果你知道以前轿夫们为了几个小钱而计较的情形，就能理解这场战争对他们的重要性。

昨天平静地过去了，我整天都在休息。晚上我们去了伦敦会教堂做了礼拜，这是座珍贵而小巧的建筑物，以接待外国人为主。克莱顿先生布道非常精彩，诺特（Knott）先生也在，还有贝京赛尔（Beckingsale）小姐，以及几位伦敦会的女士。今天我主要是在看书，我们努力搜寻所需的书籍，为以后的考试做准备。贝尔和我已经开始学习，想尽早通过考试。看来我们要呆上一段时间。我忘了告诉你们，我们的仆人中，有一个人渡江去了武昌，把我的衣服都带了回来，一部分整整齐齐地放在箱子里，另外的用一条床单杂乱地裹在一起，像是“红色葬礼上用的物品”。

好了，我不能再写了，否则会误了邮寄的时间。

送上我所有的爱。

爱你们的 埃米莉
10月23日，星期一
于汉口租界

家书三

亲爱的家人们：

这是续写上一封信，因为时间紧迫，不能一一给你们写

信。另外，信是否能顺利寄达也难以确定。英国和中国的邮局都关门了，我们只有千方百计地找机会，看是否有去上海的人愿意带走我们的信，沿江而下，在上海把信寄出。因此，我不知道你们何时能看到这封信。

我想尽一切可能，力求按顺序把本周内发生的事告诉你，当然这有点难，因为事件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它们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我先讲一讲星期二（10月24日）这一天，上封信中已经提到星期一可能有一场恶战，那天晚上，我们整夜未眠，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星期二上午，我和贝尔继续学习。下午，我们开始制作红十字袖标和做其他的事。我们这儿是红十字会的一个分支，一旦开战，伤员将会源源不断地送进来。星期二晚上，双方终于在大约离我们七英里的汉水入长江口处开战了。距离如此之近，我还以为就在我们的门外呢。一开始革命党人就占了上风，我们全都很高兴。清军被打得节节败退，不断有伤员被送到各个教会医院，但总数并不多。星期三（10月25日）和星期四（10月26日）的情况差不多。克莱顿先生星期三带我们去看了租界的防御工事，一队队的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英国士兵严守在各自的租界入口处。这次的巡视令人兴奋，守住入口主要是出于一种担心，万一一方战败，士兵会借道租界，途经内城，那他们就会边逃边打枪。星期五（10月27日）早上，传来的消息更令人兴奋，革命党人已经推进到租界的边缘，他们正在修筑工事，要开始另一场恶战。尽管革命党人已经接近了内城，但仗一直打到现在还未停，他们的装备与清军无法相比，清军有机枪和大炮，以及受过德国教官训练的士兵。然而革命党人非常勇敢，他们一次次地发起冲锋。我恨透了机关枪发出的射击声，这个可怕的家伙一分钟能射出三百二十颗子弹，杀革命党人就像割草一样，一会儿就倒下一大片。我现

在能体会戴维(David)在写赞美诗时祈求神力降临的心情,我真想用我最强烈的意志调转机枪对着清军扫射。当然受谴责的不应该是清军官兵们,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何打仗。北京政府很明白,假如清军官兵了解真相,他们肯定会投向革命党,所以清政府只告诉他们是平息叛乱,他们到了这里才领到了武器。清政府让所有的满族士兵(大约三千人)带着重武器在后面督阵,任何一个临阵脱逃的官兵都将被立即处死。现在有一些清军官兵也被送进了医院,在这里他们知道了是跟那些要使中国脱离满清统治的同胞们在打仗。真相使他们惊呆了,他们说:早知如此,他们绝不参战,但现在为时已晚。他们的话恰恰表明了清政府在他们中国士兵中不得人心。

整个上午,战斗一直在延续,枪炮声不断。炮弹呼啸着在我们头上飞过。革命党人被迫撤到了火车站。临近午夜时,枪炮声暂时停了下来,克莱顿先生带着诺拉、修女和我到火车站去。那里挤满了士兵,有些看上去还是小孩。他们在首领的鼓动下,勇敢参战。他们的情况很可怜,浑身上下肮脏不堪,但他们还是准备再投入战斗中去。清军的大炮开始轰击火车站。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幸运地回到了住地。整个下午,战火又起,租界的房子也遭到了炮击。有消息传来说:清军的舰队首脑沙元帅,在星期六(10月28日)的下午要开始炮轰武昌。所以领事馆又下了命令,所有的妇女儿童必须离开此地,登上江上的船只。我们四个人则还是留在这里,还有银行经理的夫人和三位美籍女士。经理夫人说:如果情况紧急,她就躲到银行的地下室去,她决不离开丈夫。美籍女士们忙于照顾伤员。我们也做好准备,接受任何外籍伤员。我们把两个大房间作为病房——至少诺拉和修女做这件事,我和贝尔则卷那些能够拯救生命的绷带纱布。

星期六(10月28日)下午,汉口成了一座空城。所有的

船只都开走了，只留下一艘英国炮舰凯杜斯号（Cadmus）停泊在我们房屋的正面。它的对面就是武昌，情况变得十分紧张。假如沙元帅下令轰炸武昌，来自武昌的反击枪炮就会落到租界。我们看到在长江下游三英里处的沙帅舰队。下午一点左右，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我们吃了午饭后，又开始卷绷带。枪炮声再次从后方响起，我们等了三个小时，这期间，我们看到子弹和炮弹飕飕地飞过江去。的确，三点钟时，呼啸的炮弹声又起，我们跑出门去观战。正如谚语所说：射击完美的捕鼠计划有时也会失败（the best laid schemes of men and mice: gang oft a-gley sometimes），我们发现沙元帅的舰队受阻于一个临时修筑的江上要塞，革命党人勇敢地把它修筑在下游三英里的地方，正对着清军的十一艘战舰。沙元帅根本无法炸开它，结果也过不了这段江面，它们只能掉头向后开炮，我们看到炮弹爆炸和子弹射出的火光。幸亏有了这个要塞，我们未看到武昌遭到轰炸。三位伦敦会的女士已经登上将要驶向上海的战舰，现在她们又回来了，其中包括诺特（Knott）太太。

克莱顿先生刚进来取信，他说有可能请人代为邮寄，所以我们各自都匆匆写了信。昨天是星期六（10月28日），我们一整天都紧张地卷着绷带。贝尔、克莱顿先生和我把大批的绷带送到美国教会医院。在回来的路上，一发炮弹就落在我们后面几英尺的地方。租界的大批房屋遭到轰炸，我们听到炮弹的嗖嗖声，真的非常害怕。现在战斗延伸到了内城，尽管还能听到炮声，我们却安全多了。

我不能再写了，给你们我所有的爱。

爱你们的 埃米莉

1911年10月29日

于汉口租界

注：

①英文全称：*Letters Home from Emily M. Ewins——An on the spot record of revolutionary events in Hangkow and Wuchang, Central China, 1911—1912*，按字义译为：《埃米莉·M·尤因斯家书——1911—1912 中国武昌汉口革命事件的现场记录》。

②H. M. 拉滕伯里，《拉特—赖梅——一家五代五牧师详传》（未标印刷年份）（H. Morley Rattenbury, *Rat—Rhyme: A Screed Recording the lives of five members of one family who in four generations were all Methodist Ministers*）第 21—28 页。

③循道会（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英国教会组织。总部设在英国伦敦（Wesleyan Centenary Hall, 17 Bishopsgate St. Within, London, E. C.），1852 年入华，布道区为两广两湖地区，1907 年统计有 41 位男教士、34 位女教士，中国信徒 3449 人。参见 D·麦吉利夫雷主编：《中国新教徒教会百年——百年庆典历史卷》，上海，美国长老会出版社，1907 年，第 89 页。[D. MacGillivray (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p. 89.]

④《辛亥家书》的编者拉滕伯里（H. Morley Rattenbury）于 2000 年 9 月 6 日给我一个亲笔简笺，全文如下：“我已经准许维民利用和引用我母亲（尤因斯）于 1911 至 1912 年发自中国的信件，这些信件目前已存放在曼彻斯特大学的赖兰兹图书馆。拉滕伯里（遗嘱执行人）2000 年 9 月 6 日。”（“Weimin has my permission to use and quote from my mother’s (Emily Ewins) letters from China 1911—12 now lodged in the Rylands Library at Manchester University. H. M. Rattenbury (Executor), Dated: September 6, 2000.”）

⑤新华通讯社译名资料组编，《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

⑥原注：Brecknock 大街 4 号，是凯特（Kate）姨妈的地址，显然也是埃米莉和其他人的“家”。

⑦译注：据《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

历史系合编，中华书局，1985年），当时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为禄福礼（Harry English Fulford）。

⑧原注：教会大院位于汉口城中武圣庙（Wu Sheng Miao），距英国租界3英里。在那种情况下，汽艇显然是比通常的人力黄包车更安全的交通工具。

⑨原注：即艾丽斯。

⑩原注：即贝尔。

⑪原注：L. M. S=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译注：即伦敦会。1807年入华，总部设在伦敦（16, New Bridge St, London），1904年统计有信徒14748人，其中英国信徒486人。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